

当灾难降临

灾难来临时谁能幸存，
为什么？

The Unthinkable:

Who Survives

When Disaster Strikes—and Why

[美] 阿曼达·里普利 著

陈建华 译





当灾难降临

灾难来临时谁能幸存，
为什么？

The Unthinkable:

Who Survives

When Disaster Strikes—and Why

[美] 阿曼达·里普利 著

陈建华 译

Amanda Ripley

The Unthinkable: Who Survives When Disaster Strikes — And Why

Copyright © 2008 by Amanda Ripley

Th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Publisher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08-1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灾难降临 / (美) 里普利著; 陈建华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357-5657-2

I. 当… II. ①里…②陈… III. 灾害—通俗读物 IV. X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8872号

当灾难降临

灾难来临时谁能幸存, 为什么?

著 者: [美]阿曼达·里普利

译 者: 陈建华

策划编辑: 曹 鹍

文字编辑: 陈一心

出版发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湘雅路276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 本社直销科 0731-4375808

印 刷: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书厂联系)

厂 址: 长沙市井湾路4号

邮 编: 410004

出版日期: 2009年4月第1版第1次

开 本: 700mm×960mm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4

字 数: 260000

书 号: ISBN 978-7-5357-5657-2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对阿曼达·里普利

《当灾难降临》一书的更多的称赞

■ “读《当灾难降临》一书会使生活发生改变。我们生活在一个浮躁的时代，这使我们中太多的人变得躁动不安。一旦你享有了这本杰作深厚的见识和智慧，你将会再次站在高处。在我们的政客和媒介乐于挖掘和煽动我们那些最令人难堪的恐惧时，阿曼达·里普利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可以单独地和共同地面对那些周期性地降临在我们身上的危险。我们不需要害怕！”

——斯蒂芬·弗林（Stephen Flynn） 对外关系委员会国家安全研究部的高级研究员，
和《灾害边缘：重建一个韧性国家（*The Edge of Disaster: Rebuilding a Resilient Nation*）》
一书的作者

■ “对在极端压力下的人类行为所做的一次颇具魅力的、深刻的审视。它那令人极度震惊的故事充分罗列了在受胁迫情况下人类的各种行动，从惊慌失措到英雄举动。本书不仅节奏快速和引人入胜，而且具有启发性。”

——迈克尔·图吉阿斯（Michael Tougias） 《致命预测：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关于海
难和幸存的真实故事（*Fatal Forecast: An Incredible True Tale of Disaster and Survival at
Sea*）》一书的作者

■ “（本书）揭示了，为什么在同样的被灾难困住的处境下，有些人能幸存而其他人则不能。为什么有些人会因恐惧而绝望地束手待毙，和因惊慌失措而陷于瘫痪，但另一些人却充满了力量、耐性、反应能力和其他造就了荷马英雄的内在素质。我们怎样才能保证我们将来会有应对能力呢？在她精心撰写的论著中，阿曼达·里普利让我们大家看到，如何为面对危险做准备和在横祸飞来时使我们的生存机会增加。”

——布鲁斯·亨德森（Bruce Henderson） 《纽约时报》畅销书《下到海里（*Down to the Sea*）》和《真北（*True North*）》的作者

■ “书中含有大量我们在面对危险时下意识反应方面的信息。如果某天你突然面对一种生死悬于一线的情况，读这本书将能增加你最后活下来的可能性。”

——大卫·罗佩克（David Ropeik） 《风险！：判定你周围世界真正的安全，和真正的危险的实用指南（*Risk!: A Practical Guide for Deciding What's Really Safe and What's Really Dangerous in the World Around You*）》一书的共同执笔者

■ “灾难发生时，我们总是一成不变地打听事件的‘细节’——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人幸存……阿曼达·里普利埋头写出的《当灾难降临》，对数字后面的‘为什么’提出了真正具有洞察力的见解。这本优秀图书不仅将改变你的生活，而且能很好地保全你的生命。”

——格雷格·奥利森（Gregg Olsen） 《纽约时报》畅销书《深刻的黑暗：美国最富银矿里发生的灾难与救赎（*The Deep Dark: Disaster and Redemption in America's Richest Silver Mine*）》的作者

导言

“生命变得像 熔化了的金属”



1917年12月6日早晨，一个阳光明媚而无风的日子，“蒙特·布兰克”（Mont Blanc）号法国货船开始驶离加拿大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港。那时，哈利法克斯是大不列颠帝国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欧洲正在打仗，而这个港口则在船只、人和武器的搅和下忙得不亦乐乎。“蒙特·布兰克”那天要开往法国，运送2500吨TNT炸药。在驶过该港口一个狭窄的水道时，一艘比它大一些的船，来自比利时的“艾莫”（Imo）号突然撞到了“蒙特·布兰克”的腰部。

就这个撞击本身而言，这并不是灾难性的。事实上，“艾莫”仍在继续行驶。而“蒙特·布兰克”的船员们心里却明白，他们的船是一个随时都会爆炸的炸弹。他们试图去灭火，但不久就放弃了这种努力。然后他们爬上救生艇，向岸边划。又过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时刻，“蒙特·布兰克”漂进港口，撞在墩船上，墩船也烧了起来。孩子们站在岸边看热闹。

历史上许多大灾难开始的时候都是很不起眼的。一个意外会引起另一个意外，直至在文明社会中造成一系列的破坏。大约在碰撞发生20分钟后，“蒙特·布兰克”爆炸了，带来了黑雨、铁块、大火，而风则像拉锯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刮来刮去。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炸弹爆炸。它将60英里（1英里=1.609千米）以外的窗户都震碎了，碎玻璃刺瞎了大约1000人的眼睛。接着，爆炸引起的浪潮淹没了海岸。然后大火开始蔓延到这个城市。港口处的黑色浓烟火柱变成了

盘旋而上的白色蘑菇云。幸存者跪在地上，坚信他们在天上看到了德国的齐柏林飞艇。

爆炸发生之时，一位名叫塞缪尔·亨利亲王（Samuel Henry Prince）的英国国教牧师兼学者，正好在港口附近的一个餐厅里用早餐。爆炸发生后，他跑去援救，将他的教堂门打开以接待伤员。十分奇怪的是，这是亲王在5年时间里遇到的第二次灾难。他曾应对过1912年发生在当地的另一次灾难，那次是一艘名叫泰坦尼克号的豪华游轮在离哈利法克斯海岸大约500英里处沉没了。那时，亲王对着冰冷的海水主持过葬礼。

亲王是一个对别人不愿去想的事情感到好奇的人。在可怕的爆炸发生的那天，他看到的情形竟然令他大为惊骇。男人们和女人们都继续在那粗糙的人行道上做他们的工作，看不出有多大痛苦。一位年轻士兵的一只眼睛被炸掉了，怎么还能工作一整天呢？有些人体验到了幻觉。为什么父母在医院里，尤其是在太平间，认不出自己的孩子了呢？这些细节令亲王困惑不解。在这个发生爆炸的早晨，为什么这第一个救援站竟是由一群参与者和老百姓所组建的呢？

那天晚上，一场袭击哈利法克斯的暴风雪，成了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等到这场灾难卷过这块陆地以后，大概有1963人死亡。在这场灾难后摄制的无声影片里，哈利法克斯看起来好像经受了一场核战争。房屋、火车站和教堂好像胡乱堆积在大雪覆盖的地上的棍棒。雪橇上尸体堆得高高的。亲王大概可以写下：“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由战争、地震、大火、洪水、饥饿和风暴联合，即人类灾难纪录中的第一次恐怖的联合袭击下的情景。”后来，那些发明原子弹的科学家们，应该研究一下这场发生在哈利法克斯的爆炸，看看一场灾难横扫陆地与海洋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帮助哈利法克斯重建后，亲王移居到纽约搞社会学研究。在哥伦比亚大学，为了撰写博士论文，他对哈利法克斯的爆炸作了解构。1920年出版的《大灾难与社会变化》，第一次对人类在一场灾难中的行为作了系统分析。“生命变得好像

熔化了的金属，”他写道，“旧习惯崩溃，而不稳定性支配着一切。”

亲王的著作吸引人之处在于他的乐观主义。尽管他悲哀苦恼，但他却把灾难看成是机会，而并不仅仅是像他曾指出的那样：“一系列兴衰在最后灾难的某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他曾任部长，但他显然醉心于工业。这场爆炸最终“把哈利法克斯炸到了20世纪”，迫使许多变化向更好的方向改变。他的论文以一段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引言开头：“这可怕的灾难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历史并未因此终止。这是它将翻开新的一页的方式。”

亲王死后，对灾难中人类行为的研究便沉寂了。但是后来，随着冷战开始以及关于人们在核攻击下应该如何应对之类的一些新忧虑的产生，又使这个问题重新回到了生活中。前苏联解体后，它再次沉寂，直到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亲王似乎预见到诱惑人们的事物会转移他们的视线。他写道：“出现在哈利法克斯的这一小规模事件只是一个开始。”不要让它成为终点，他恳求地说。“只有在对许多大灾难进行最忠实的审查以后才能科学地增长知识。”这个世纪的残余物将会以其素材证明很多东西。

我们大多数人都曾想象过，经历一次飞机失事，或一次火灾，再或者一次地震，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会想到：我们可以做什么或不可以做什么，我们会怎样感觉到心在胸腔里剧跳，在那最后的时刻我们会呼叫谁，以及我们是否会突然无法抗拒地抓住坐在靠窗座位上那个商人的手。我们有我们公开承认的恐惧和我们从未谈论过的恐惧。后面这个只造了一半的句子，我们可以根据各个时候不同的忧虑情况而填进不同的场景：如果……的话，我想我该做的是……

我们默想一下我们所知道的故事吧。当我们说“灾难”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想到的是惊慌失措、歇斯底里的人群，以及一种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残忍，一种只被专业救援人员的文明影响中止的破坏行动。然而，来自亲王的所有证据都与这样的剧本相矛盾。事实要有趣得多，也有希望得多。

亲王在哈利法克斯发现的是，我们面临的灾难的特征可能完全不同于我

们以为会碰到的那种。但那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可知的，只是表明我们没有看对地方。

■ 幸存者想让你知道的

这本书出人意料地改变了方向。2004年，作为报道“9·11”事件3周年的《时代》杂志记者，我决定调查某些事件幸存者。我想知道他们目前在做些什么。与大多数蒙难的家庭不同，这些幸存者绝大部分呈自闭状态。他们感到幸运或有罪恶感或创伤感，以至于他们不想再聒噪了。但从那里出来的有成千上万的幸存者，这些人早晨去一个摩天大楼上班，度过了忙碌的几个小时再从那里出来。我想知道这对他们的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影响。

我与最先成立也是最大的支援团体之一的世贸中心幸存者网（World Trade Center Survivors' Network）取得了联系，随后他们邀请我列席了一个常规会议。他们在一个被荧光灯照亮的办公室里碰头，远离了时代广场的喧嚣。那天晚上，我在搭乘电梯时准备了一个伤心故事，以便与他们交谈时用。“9·11”之后我曾听到非常多的故事。每个鳏寡者、消防队员以及受难者都有他们可讲的、独特的悲惨故事，我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出这些在交谈中听到的故事。这个城市的悲痛好像没有底。

但这次会议并不像我所预料的那样。这些人已经有了一个议程。也许还会有恐怖分子袭击，所以他们要把一些事情在下一次恐怖分子袭击之前告诉别人，而且这是目前这所房间里迫在眉睫的事情。这些幸存者尽管所处地区、职业、种族各不相同，但他们讲的事情却惊人的相似。他们知道很多那天早晨的事情，而他们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准备去应对这些事。有个男士甚至提议启动一次巡回演讲，以便让人们知道逃出摩天大楼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一位女士说：“我们是急救先遣队。”大家签名通过了在教堂和办公室里进行演讲的计划。

看着他们，我意识到这些人窥见到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没看到的人类状况的一角。我们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可怕的事情担忧，但我们对实际感受会是什么样子却知道得不多。我想知道他们得到了怎样的体验。

我开始研究在另一些灾难中幸存的人的故事。雷同的情况令人吃惊。经历过海难、空难和洪水的人，好像都发生了一次神秘的蜕变。在某些方面他们做得从未有过的好，比预期的要好得多，而在另一些方面则要差得多。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而使我们做出如此多意料不到的事情？我们真的习惯于在海难中为陌生人去冒生命危险吗？我们身上的编程已进化成在紧急情况下反应迟钝了吗？寻找答案的研究驱使我走向世界：到英格兰了解有悠久历史的火灾研究，到以色列是为了创伤心理学和反恐行动体验，回到美国则参与模拟飞机失事和火灾，以及军事行动在大脑中起作用的研究。

写一本关于灾难的书听起来好像是窥探隐私或心理阴暗，而过去也的确有这样的情况。但事实是我被这一课题所催眠，因为它给了我希望。你花了足够多的时间报道悲剧，而后你开始寻找立足点。我知道，所有灾难都是无法预防其发生的。我也知道做好应对灾难的准备，将损失降到最低是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安装烟雾监测器，买保险，包好“逃生时随身带的袋子”。但这些措施没有一个让人满意。



听着幸存者的讲述，我体会到，我们是在不知道一句台词的情况下做戏剧彩排。我们的政府警告我们要做好准备，但不告诉我们为什么。在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后的新奥尔良，我从街头那些普通人那里听到的东西，比我从任何国家安全会议上听到的都要多。在消防站和脑研究实验室，我明白了，如果我们在灾难发生之前知道我们将面对的灾难的特性，那么，我们生存的机会就可能稍微要好一些。至少，我们能清除想象出来的、显得无知的部分，揭示关于我们自己的秘密。

我从未期望在任何时候很快用上我学到的东西。我出现在受灾地通常是在灾难发生后，在遗憾和反责的时候，而不是正在地震或正在起火的时候。但在有个方面我是错的。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着小的灾难演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写了一本关于灾难的书后，我感到焦虑减少了，而不是增多了。我现在对危险的判断要准确多了，因为我知道以前歪曲了关于恐惧的等式。在研究了十几次空难后，在飞行中我就放松多了。而不管我在晚间新闻中看到的代码——橙色——可怕——非常可怕的警报有多少，已经窥见过最坏情景的我，都会感到一定程度的平静。事实表明，实际情况通常要比噩梦好些。

■ 搜救狗的问题

有关灾难的交谈往往会因害怕和迷信而被歪曲。Disaster一词由拉丁文dis（消失、背离）和astrum（命运）组成，可以被翻译成“ill-starred（运气不好、不幸）”。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新奥尔良市长雷·纳金（Ray Nagin）说，上帝显然因为美国入侵伊拉克而“对美国发怒”了或者是因为“黑人没有照顾好自己”而对黑人发怒了。尽管这些言论可能是不成熟的，但纳金的激动给混乱注入了内涵，却是可以理解的。讲述故事往往是恢复的开始。

但讲述故事可能会错过重要的非主线情节。在书本和官方的报告中，卡特里娜的悲剧成了对政客、贫穷和豆腐渣工程的谴责，就像已经发生的那样。但

还有另一种应该出现的对话——不是涉及责备，而是关于理解。在风暴前、风暴中和风暴后，这些普通市民在做些什么呢？为什么？而哪些事情他们能做得更好呢？

这些天来，我倾向于将灾难看成是上帝和政府的行动。普通人在这个复杂的体系中扮演的是受难者，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普通人是灾难发生地最重要的人，每次都是如此。

1992年，墨西哥的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因裂缝而煤气泄漏，导致一系列下水道爆炸。破坏力来自地下，将相邻的一个个小区断开了。从上午10:30开始，先后至少有9次爆炸，将地面炸开了1英里多长的锯齿形的裂口。大约有300人死亡，5000间左右的房屋被夷为平地。墨西哥军队被招来救援，加利福尼亚的救援者也赶来救助了，搜救狗也受命向灾难发生地进发。

但是，在任何援助到来之前，首先是普通人在现场相互援救。这些普通的人做过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用汽车的千斤顶将石块从幸存者身上挪开，插入花园浇水用的软管，让空气进入被困人群所在的空隙里。事实上，像在大多数灾难中一样，援救工作的绝大多数是这些普通人做的。最初两小时，只有很少的人从碎渣中活着出来。而搜救狗则直到爆炸后26小时才到。

只要有一次灾难打击，普通市民就能认识到他们自己是多么重要。例如，你是否知道在大多数严重空难中是可以活下来的？关于这一点，统计学结果是非常明确的。在1983年到2000年间严重^[1]空难的全部乘客中，有56%的人活了下来。而且，严重程度常常与乘客的行为有关。这一事实已在航空业内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间了。然而，除了经历过飞机失事的人外，大多数人则全然不知。

自“9·11”以来，美国政府以国土安全的名义给一些州和城市送去了230多亿的美元。但将我和你这样普普通通的人招聘到这项事业中，对这样的明智

[1] 由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定义的“严重”是指：涉及大火、重大伤害、重大的飞行器损坏等。——译者注

之举则几乎没花任何钱。当国家面临恐怖分子袭击橙色警报时，为什么我们不去告诉人们做什么——而只是告诉他们可怕呢？为什么怀俄明州卡斯帕市的每个消防队员有一套1800美元的HAZMAT制服——但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了解实际面临的、经过统计而得来的、危险的等级，也不是都有一种灵活的、有创意的应对这些危险的计划？

在全国各地，我们都给职业救生人员配置了坚不可摧的防护装置。作为回报，我们对这些勇敢的男人和女人有着非常高的期望。只是在每件事情都不对了之后，我们才认识到要靠我们自己。而灾难越大，靠我们自己的时间就越长。没有一个救火的部门能马上无处不在，不管它们的机构运转得多么好也做不到这一点。

2005年7月7日，恐怖分子袭击伦敦巴士和地铁，杀死了52个人。这个城市广泛设置的监视摄像机在其后的调查中大派用场，因而受到普遍的赞赏。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这种技术对那些在列车上的普通人是多么无用。对该反应所做的官方报告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基本的教训”：应对紧急情况的计划是为了满足紧急情况下的官员们的需要，而不是普通人的需要而设计的。那天，乘客根本无法让列车驾驶员知道曾经发生了一次爆炸。他们也很难下车，因为车门是设计成不让乘客打开的。最后，乘客找不到救护受伤者的急救箱。结果是，补给品滞留在地铁监管人员的办公室里，而到不了列车上。

■ 运气是不可靠的

这里是本书所表述的主要两难议题：我们今天轻率鲁莽地对待危险，将城市地平线建在阿里系的飓风中，并将小区建在（地震）断层线的顶端。主要是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灾难已变得更加频繁也使损失更加惨重。但是，在我们建造出越来越让人惊叹的大厦和飞机的时候，我们在建造使人们更好地生存的建筑方面却做得越来越少了。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想知道我们幸存者的行为——以及不端行为——有多少是可以用进化来解释的。终究，我们的进化是为了逃避被猎食，而不是为了高耸入云达1/4英里的大厦。科技是不是已经完全超越了我们的生存机制呢？

但有两种进化：遗传学性质的和文化性质的。两者都能决定我们的行为，而文化性对许多事情的作用则更快。我们有很多办法创造“天分”，我们可以学得更好或更坏。我们可以将如何应对现代危机的传统传下去，就像传递语言一样。

于是问题变成：为什么我们不能将通过文化灌输生存技能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呢？全球化是那些造成劫机频繁发生而失去其本意的词汇之一。部分原因是这个词的含义太多，还包括一些相反的意思。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我们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变得少多了。同时，我们也变得更加相互依赖和依赖科技了。我们被隔离在相互依赖中，处于一种自我矛盾的境地。

80%的美国人住在城市里或靠近城市的地方，靠着伸向四面八方的、公共和私有的实体网络来得到食物、水、电、交通和医药。我们几乎不会为自己做任何事。所以，一个打击一群人的灾难进而影响到其他人群的可能性比过去更大。但是，在我们变得更加相互依赖的时候，我们也变得与我们的邻居和传统更加分离了。这是一种与我们的进化史的断裂。人类和我们的进化祖先，在过去几百万年，大多数时间是在有亲属关系的小群体中度过的。我们通过一代一代地传递我们的基因——以及我们的智慧——而进化。但在今天，各种曾经保护我们不受威胁的社会纽带被我们忽视了。在用到它们的地方，我们用新科技代替了，而新科技则仅仅只在某些时候起作用。

1960年5月，迄今测到过的最大的地震在智利沿岸发生，导致了1000人死亡。幸运的是，夏威夷的自动报警系统命中了它，并在该岛遭到打击前10小时发出了海啸警报。这项技术完全按计划的那样发挥了作用。但结果是，大多数听到警报的人并没有疏散撤离。他们弄不清这种噪声是什么意思，有人认为这

是一种提醒他们将会有更多消息的信号。技术到位了但习惯却不到位。那天，夏威夷总共有61人死亡。

对于为什么我们在极端紧迫的情况下会那样做，很难追寻出单个的原因。以下的章节将可使我们测试几个应对实际灾难的假定。我已经克制住了编一个大故事的欲望。但即使在那种复杂的事物中，简单的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我遇到的灾难幸存者越多，我就越确信解决我们的问题不需要太复杂化。解决办法更倾向于社会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虽然有些仍是老调重弹。但在我们能够拯救自己之前，我们需要认识在灾难中我们的大脑是怎样运转的。

在作更多论述前，我们承认绝大多数西方人不是死于灾难或许将是明智的；他们死于来自他们体内的疾病的攻击，而不是来自外部的暴力。老年痴呆症杀死的人比火灾杀死的要多得多。即使降临在你身上的是一种特别戏剧性的去世，也不可能是在一次灾难中。你死于食物中毒的可能性比溺水而亡的可能性更大。

然而，可能性更大的是，你会受到一次灾难的侵袭。在2006年8月的《时代》杂志有1000个美国人参与的投票中，其中大约一半的被调查者说他们曾亲身经历过一次灾难或公共场合的突发事件。事实上，根据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意外与易受伤研究所（Hazards and Vulnerability Research Institute）2006年为《时代》杂志所做的估算，大约91%的美国人住在中度到高度地震、火山爆发、龙卷风、野火、飓风、洪水、破坏性疾风或恐怖行动危险地区。

灾难一词习惯上是指任何引起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的突发不幸事件。在这本书里你会发觉，我却转向了从技术上讲有点不确切的不幸事件：例如车祸和枪击事件。但我把这些每天发生的悲剧包括进来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人类的行为是相同的，不管我们是在一艘游船里还是在一辆本田汽车里。我们可以从研究在一次武装抢劫中我们如何表现，了解到我们在地震中可能会如何表现，而反过来也是成立的，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车祸、枪击暴力事件和飞机失事一样是现代的不幸事件，我们还没有进化出在其中幸存的本领。

广义地定义灾难的另一个原因是，小的悲剧叠加起来即成巨大的悲剧。在美国每年因车祸而死的人数累积达4万。每一个读此书的人都会认识一个死于某次车祸中的人。枪击每年再导致另外3万美国人死亡。对受难者的朋友和家庭，这些受到波及的圈子中的人来说，枪击给他们的感受就像一场灾难，只是未被全国公认。所以，我广义地定义这个词，将所有类型的、死了很多人的事故都包括了进来。

最后告诫：灾难是可以预言的，但在灾难中幸存则是不可预言的。没有人能担保给你一个逃生计划。如果生还有死是如此简单的话，这本书应该已经被写出来了。但那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在放任无知的状态下生活。正如亨特·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所说的：“呼唤上帝，但远离暗礁。”

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身上最古老的个性，那个被带进危机中，甚至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飞快地出现的个性。这是“我们是谁”的核心。“如果一位工程师想知道他正在设计的东西的情况，他可以将它置于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彼得·汉考克（Peter Hancock）说。彼得为美国军队研究人类的表现已有20多年。“就人类而言这是相同的。如果你想发现事物在正常情况下如何运作，非常有趣的是，却发现我们在压力下是如何运作的。”无需太过费力，在巨大压力下，我们能教会我们的大脑更快地工作，也许还是更明智地工作。我们已经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地把握着命运了。但是，我们需要停止对自己的低估。

知识就出自那里。在实验室和枪击范围里，有知道在极端紧迫下我们的身体和头脑会发生些什么的人。研究大脑的恐惧反应的科学家现在可以看到，在压力下我们的大脑的哪一部分将发光。军事研究人员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试图预言在紧要关头谁会软下来，而谁又会斗志昂扬。警察、士兵、赛车驾驶员和直升机飞行员，将训练在最坏时刻他们可能遇到的怪异行为的预见能力。他们知道，在危急时刻再去学习这些知识就太晚了。

然后还有那些灾难后的幸存者，传达受难者声音的见证人。他们曾在那里，坐在受难者旁边，看到了受难者曾看到的。而自那以后，这些幸存者会在

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人死了他们却活了下来。他们是幸运的，他们所有人都是。运气是不可靠的。但我曾遇到的幸存者几乎全部都说，有些事情他们希望他们能早就知道，有些事情他们希望你也知道。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好人很少相互交谈。飞机安全专家没有和神经科学家交换故事，特种部队教官与飓风受难者接触不了多长时间，而所有这些人没有什么机会将他们所知道的传给普通人分享。于是，他们的学识遗产就隐藏在一种人类经验的黑箱里了。

本书将进入这个黑箱并在那里呆下来。这本《当灾难降临》不是关于灾难恢复的，它是一本关于在灾难中警察和消防队员到来前，记者们穿着雨衣出现之前，某个建筑物被征来为伤亡者使用之前，发生了什么的书。这本书所涉及的逃生反应弧，是我们所有人在从危险走到安全的过程中都会经历到的。

逃生反应弧

在每种类型的灾难中，我们都起始于大约相同的地方并经历3个阶段。我们称第一阶段为否认（不相信）。除了在极端可怕的情况下之外，我们一般倾向于展示一种创造性的和固执的否认标记。这种否认可能采取拖延的形式，而这却可能是致命的，就像“9·11”时某些人所遇到的那样。然而，如果情况如此危险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否认所起的别的作用是什么呢？

拖延会持续多长时间，大部分将取决于我们对危险是如何考虑的。我们对危险的分析，依据事实的成分少于对死亡的模糊感觉，正如在第2章所详细讲述的某个男人等待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的故事那样。

一旦我们通过了否认阶段的最初打击，我们将转向沉思，逃生反应弧的第二阶段。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严重了，但我们不知道对此该做些什么。我们将做出怎样的决定呢？第一件被认识到的事情是一切都不正常了。我们各自不同地思考和体察着。我们变成了认知有缺陷的超人。第3章将通过一个在鸡尾酒会上被挟持为人质的外交官的故事来探讨恐惧解剖学。“有时害怕是好